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对话中的道德建构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

胡振明 著

Moral Construction

in Dialogue: Dialogism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中的道德建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 /
胡振明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81078-966-0

I. 对… II. 胡… III. 小说 - 文学研究 - 英国 - 18 世纪
IV.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846 号

© 2007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对话中的道德建构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

胡振明 著

责任编辑：章 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40mm × 203mm 7.75 印张 187 千字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078-966-0

定价：20.00 元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顾问：胡壮麟 吴元迈

专家编委会

主任：王立非 金 莉 许 钧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立非	王 宁	王守仁	王克非	王初明
牛保义	文 旭	文秋芳	石 坚	申 丹
冉永平	宁一中	朱永生	朱 刚	仲伟合
刘世生	刘象愚	许德金	严辰松	杨永林
杨金才	杨信彰	李 力	束定芳	何其莘
辛 斌	沈 弘	张 冲	张克定	张绍杰
张春柏	张德禄	陈建平	罗选民	周流溪
姚小平	顾曰国	徐 珺	黄国文	盛 宁
韩宝成	程晓堂	程朝翔	虞建华	谭载喜
熊学亮	潘文国	穆 雷	戴曼纯	

总策划：刘 军

总 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了大型外语学术专著系列——《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邀请我为文库写序，借此机会，谈谈我个人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和感受。综观 21 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就语言学研究而言，形式语言学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理论继续对抗和对话，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发展迅速，各种语言学的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语言事实；在应用方面，语言学更加广泛地与多学科交叉，运用和借鉴包括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生态科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在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断凸显出语言学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地位。就文学研究而言，英美文学研究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文学及文论研究都关注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关系。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引发了文学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的思考，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相互影响和交融日益明显，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话语分析等，反之亦然。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在全球化和中国入世以后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发展更加迅速，同时，我们仍清楚地看到，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依然存在“三张皮”现象，第一张皮是“汉语与外语”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不够；

第二张皮是“语言与文学”研究的沟通与对话不够；第三张皮是“英语与其他外语”研究的来往和交叉不够，“三张皮”极大地阻碍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这套文库的设计体现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学科融通的思想，是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学术平台，是各种研究的阵地，各位学者的家园，进入文库的研究成果都经过精心挑选，出自学有专长的博士和学者。我衷心地祝愿这朵“原创的小花”在繁花似锦的学术花园里开得绚丽灿烂，愿更多的学者关心和呵护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立非

2007年6月1日于北京望京花园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章 小说兴起中的道德探究	(21)
第一节 小说兴起中的道德因素	(24)
第二节 文学目的之争	(35)
第三节 对话中的道德建构	(43)

第二章 自我建构中的双声	
——《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对话性	(53)
第一节 自传独白中的社会性	(59)
第二节 宗教意识与个人发展的妥协	(77)
第三节 多重身份的对话融合	(86)
第四节 对话与妥协	(99)

第三章 融合中的双声	
——《帕梅拉》中的对话性	(113)
第一节 文本中的对话	(119)
第二节 对话中的困惑	(124)
第三节 美德的价值	(132)
第四节 美德与财富的对话融合	(145)

第四章 对话中的成长	
——《汤姆·琼斯》中的对话性	(168)
第一节 美德之争	(173)

ii 对话中的道德建构

第二节	对话的未完成性	(180)
第三节	双重反讽中的对话	(188)
第四节	善的成长	(205)
结束语		(224)
参考文献		(227)

导 言

十八世纪是英国君主立宪政权巩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全面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诸多公共领域的建构，以此塑就本阶级的社会公众意识。他们通过宣扬新道德观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试图使新道德成为建构个人身份、塑造社会意识的途径。文学家们出于同一目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进行道德说教，文学公共领域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建构的一个主战场，并和政治公共领域相互融合，共同塑造了公众意识。^①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精神、道德理念变迁的记录，成为社会意识的缩影。新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始于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潮推动下，原本以神为中心的中世纪道德理念开始向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观转变，到了十八世纪，转变基本定型。这个转变开启了人类对自我的新认识，为新道德观的建构奠定了认知基础。道德主体由神向人的转变使道德规范准则也随之相应变化。在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实用主义道德观念影响下，原本以上帝与人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准则开始让位于以人与人为中心的功利性道德观。道德主体以及规范准则的变化影响了文学作品中进行道德建构的叙述策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在创作实践中开始尝

^①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试以具体的人物，而非印证神意的概念化人物作为道德建构的主体；道德规范准则着眼于个人的现实存在，借助人际关系展开文本叙述对话。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认为笛福等人“用所涉及的人物个性、时间、地点的特殊性这样一些故事细节来使读者得到满足，”他们所采用的叙述策略被概括为“形式现实主义”。^①在瓦特看来，这种新叙述策略成为小说文类地位得以确认的叙述表征。采用新叙述手法的文学作品借助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依托于现实生活故事情节吸引了读者，赢得他们的喜爱，作品中的道德寓意也就易于被认同和接受。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在新思想所促发的新认识基础上萌芽、发展，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道德说教目的与文本叙述策略对话融合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成型。十八世纪英国以及西欧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经历了自中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整个十八世纪最初以科学革命为先导，引发了物质认识的变更，继而以启蒙运动为延续，带动了思想认识的新变革。新思想的特点是以反对盲从任何古代权威，依靠自己的思维能力遵循知识的引导而认知世界，以实用价值作为知识探求的出发点，以否定宇宙神秘性来肯定人类的认知伟力。^②肯定个人价值和认识能力的新思想成为新兴资产阶级进行个人身份建构和社会意识塑造的认识基础，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新主题。被赋予自我思考能力的作品人物第一次在英国文学作品中成为整个叙述的中心。此时的英国文人热衷于让读者相信虚构文学作品人物的真

① [英]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7页。

② 参见[美] 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5-116页。

实性，笛福等人频频以“真实”、“历史”等字眼为自己的虚构作品“正名”，但真正使读者接受虚构的真实的原因就在于笛福等人在文本中建立了一个和现实生活同样复杂的叙述世界。在这个叙述世界里，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多语共生”状态，各种独立声音和意识彼此交织，密不可分，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如果小说要忠实于自然，它必须呈现自然的合成状态。”^① 英国小说先驱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笛福等人的努力下，旨在向读者展示具有现实生活质感的小说得以发轫、兴起。

众多各自独立的声音和意识在小说文本中得到了统一，呈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笛福等人试图在作品中的诸多思想融合基础之上确立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从而达到建构社会意识的目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与封建势力展开权力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道德领域从对手那里夺取话语权，以他们自己的意象对文化、道德符号以及蕴意进行重新界定。^② 小说成为资产阶级道德建构的重要媒介。以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为代表的英国小说家们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在作品中探讨善、恶，通过作品人物的道德建构过程来影响读者的个人意识，劝诫读者，达到说教的目的。教导读者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目的，也是他们的职责。小说，这个新文类是在笛福等人有意识的“道德培育”下萌芽的。

小说这个“新文类”虽然直接脱胎于新闻故事、人物传记等现代叙事文体，但也与史诗和传奇等传统叙事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是，史诗和传奇所展现的生活是“绝对的过

① Terry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57. (本论文之英语文献引文均为作者自译。)

② Terry Eagleton, *The Rape of Clariss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 2.

去”，如同一个封闭的圆圈，“内中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完全完成了的东西。”^① 在它们自足、封闭的语境中，读者的个人经验和认识无法参与文本叙述建构。文本中的道德寓意成为单向独语，缺乏与读者的有效互动。小说则与史诗、传奇不同，它具有开放性，既有对不同思想内容包容的一面，也有对不同表现形式包容的一面。笛福等人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史诗、传奇等不同叙述方式之长，文本呈现出开放性，“小说成为不能被精确下定义的文类”。^② 小说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为再现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叙述文本的世界和读者现实世界开始了真正的沟通。笛福等人从封闭的、抽象理念所禁囿的叙述模式走出来，采用了开放的、人物形象具体化的新策略。

在文学作品中进行道德建构，常见的通病莫过于确定一个道德观点，然后整篇都不厌其烦地把这个观点再三点明，用简单的因果报应规律统摄全文。这种违背文本内在审美规律的说教方式不仅肤浅，而且效果适得其反。缺乏审美快感的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又如何去实现文本中的道德教益意义呢？笛福等人避免了这种庸俗化的道德说教，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用道德说教取代审美愉悦。虽然他们都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但无论是谁，在小说中都没有把道德寓意以简单化、口号化的方式来展现。如普罗宾所言，他们寻求的是将“虚构的愉悦与外显的道德说教审慎地融合起来。”^③ 在他们的笔下，小说作品并没有成为布道文。笛福没有刻意地

① [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

② Terry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p. 1.

③ Clive T. Probyn, *English Fic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00 - 1789* (London: Longman, 1987), p. 5.

为说教而说教。他将道德寓意编织进故事情节之中，用普通而真实的事例本身来阐述说教目的，进行春风化雨般的教化。在《鲁滨孙飘流记》的序言中，他写道，“述者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处处采用朴质和严肃的态度，并且在叙述时别具慧心，把一切事迹都联系到宗教方面去：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教导别人，叫我们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敬重造物主的智慧。”^① 理查逊的《克拉丽莎》突破了陈腐的说教模式，让一个贞淑堪称楷模的克拉丽莎在经历诱惑、考验之后香消玉殒，这违背了传统的“好人必得好报”说教模式，令当时喜爱克拉丽莎这个人物形象的读者们难以接受。理查逊自己这样解释道：“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们……也有过错；这些过错足以说明为什么上苍会把不幸和痛苦降临在他们的头上。”^② 菲尔丁在《汤姆·琼斯》的开场白中提出要为读者提供“人性”阅读食物，作者要想使这份“食物”可口，就需要掌握“调和味道、掌握火候、搭配和装盘的手艺”。^③ 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显然体现不出这种手艺，也达不到让作品“可口”的目的。菲尔丁通过“双重反讽”^④ 的叙述手法来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在他看来，“‘人性’，尽管只有一个名称，其中却包含着千变万化的丰富内容。”^⑤ 丰富变化的人性成为人物道德的依托，成为构成道德实践过程复杂性的内因。菲尔丁将人性与道德结合起来，让

① [英] 丹尼尔·笛福：《鲁滨孙飘流记》，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

② Samuel Richardson, *Clarissa*, ed. William King and Adrian Bo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29-1931), p. 314.

③ [英] 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上卷，黄乔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④ William Empson, “Tom Jones”, *Tom Jones: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Sheridan Baker, 2n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1995), p. 713.

⑤ 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上卷，第4页。

道德说教有着文本依托，从而让读者意识到善、恶应该和具体情境中的人和事结合起来，道德说教远非作者告知读者孰黑孰白那么简单。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们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所进行的阐释和总结可以被视为小说理论的初探。他们关注的小说本质、社会功能与道德标准、真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等已经涉及到了小说理论的三大范畴，即小说的目的、手段和来源，并“对英国小说批评的孕育与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后继者们延续了他们对小说文本与道德说教互动的探讨。在随后的十九世纪，小说的道德教诲功能成为小说创作与评论的主旋律。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特罗洛普和乔治·爱略特等，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有着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图，当时的批评界也热衷探讨小说的道德功能及其文本实现方式。^②进入二十世纪后，对小说道德关怀的重视仍然具有生命力。F·R·利维斯在1948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中认为，伟大的小说必须显示出深刻的道德关怀。在他看来，“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义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③道德关怀是评价小说的尺度。利维斯认为，菲尔丁对人性关怀简简单单，不配被称为小说大家；而简·奥斯丁与乔治·爱略特的小说有着丰沛的道德关怀，读者从中得以领会小说的形式之美。“伟大的传统”既是文学作家创作理念的继

① 殷企平、高奋、童燕萍：《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② 详见《英国小说批评史》的相关章节。

③ [英]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4页。

承，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延续。

利维斯的观点是文以载道传统认识的延续，当代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界也有着同样的深切关注。瓦特、麦基恩、J·保罗·亨特在各自重要专著中探讨了道德说教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是瓦特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的兴起》。这本在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推动了后继者对英国小说的理解，用克罗尔的话说，臧否《小说的兴起》成为绝大多数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著的立论之基。^①瓦特用洗练的语言，精辟的见解对小说兴起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和哲学前提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卓越、独到的解析。《小说的兴起》最为成功之处在于瓦特通过细读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人作品归纳、总结出小说这个新兴文类的体裁特征，即“形式现实主义”。具体的人物、时间、空间成为实现人物个性化的手段，也成为小说叙述策略的具体体现。瓦特同时对笛福等人说教意图在文本中的实现方式予以解析。清教个人主义使克鲁索的日常生活具有道德寓意，对他荒岛历险的详述是进行道德建构的有效方式。理查逊借助清教道德理想与十八世纪英国女性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勾勒出理想的美德得胜过程。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运用戏剧化语言与情节进行积极的传统道德建构，在广阔的社会层面开拓读者的道德感。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个人的道德理念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形式与技巧。

麦基恩的《英国小说的起源》对瓦特专著基本观点进行了修正。与瓦特强调小说与其他叙事作品的区别不同，麦基恩认为对作为十八世纪新兴文类的小说的理解需要和其他文类的

^① Richard Kroll, "Introduction," *The English Novel*, volume I, ed. Richard Kroll (London: Longman, 1998), p. 2.

历史结合起来，用辩证的方法来解析。在他看来，小说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当小说具备其他文类无法企及地阐述、解释一系列早期现代社会经验至关重要问题的能力时，它才达到形式上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小说因着亟待解决那些被视为“类型不稳定问题”（Problems of Categorical Instability）的现实需要而兴起。小说关注两种不稳定问题，一种是“文类类型”（Generic Categories），另一种是“社会类型”（Social Categories）。前者反映出认识论危机，即如何在叙述中讲述真理的认识态度上的重要文化转变；后者折射出如何将外在社会秩序与社会成员内在道德状态结合起来的层面文化危机。前者被麦基恩称之为“真理问题”（Questions of Truth），后者则被称为“道德问题”（Questions of Virtue）。真理与道德问题虽然涉及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各自的表述方式，但它们在一个重要层面有着类似之处，即叙述文本需要怎样的权威或文本实例来把真理向读者表明；需要怎样的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来将个人的道德明示给他人。在麦基恩看来，十八世纪的文类、社会类型的不稳定成为事关真理与道德如何被最为真切展现的态度层面转变的反映，小说正是为了协调这种态度的转变而成型。^①

亨特的《小说之前》是瓦特和麦基恩对小说进行文化背景解读的延续。他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有它自己的过去和历史，和其他文本有着不同程度的交织融合。文化背景不仅对作者的个人意识产生影响，而且对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也产生积极作用。虽然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小说的文类地位已经得到确

^① Michael McKe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 - 17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0 - 21.

认,但它不应该被视为文学叙述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十七世纪末期与十八世纪中期多重文化力量交织语境下产生的结果。与大多数现代批评家尽量避免文学的说教问题不同,亨特在《小说之前》中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专门论述十八世纪的说教文学,概述了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关注所在。他指出,十八世纪以宗教文学为代表的说教文学广受欢迎的事实折射出时代的道德焦虑。这些焦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与关注,从而影响到了小说叙事文本,使其具备有异于其他文类的特征。例如,说教文学所秉承的宗教忏悔习惯促使说教者重视细节的描述,从而在对读者言行进行具体指导过程中阐发神意。笛福和理查逊都写了大量说教作品,他们的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类似的实例。亨特从行为指南等说教作品中归纳出四种对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特点:警示懒散之危害,指出享乐的伦理危险,强调榜样的教化力量,坚持不断自省对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①亨特认为,虽然诸如精神自传等叙述形式或多或少地具有同样的特征,但“只有小说将文化的焦虑充分发挥成文本的创新性长处,把自己表现为自省的典范,可以把读者的消遣变为教益,成为生活的实际(和道德)指南。”^②

瓦特、麦基恩、亨特三人在关于小说起源的探讨中都注意到了小说兴起中的道德因素,都认可了道德说教意图与小说叙述策略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他们着力从小说发展的时代、文化背景等宏观角度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对话过程。我认为,十八世纪英国时代、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思潮等外在因素对小说的道德建构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小说文本存在着内在

① J. Paul Hunter, *Before Novels: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 (New York: Norton, 1990), p. 274.

② Ibid., p. 288.

的能动因素，文本的叙述策略成为道德建构得以实现的依托。小说道德说教意图与叙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契合是建立在文本创作以及说教活动的共通性，即对话性之上。

小说的发展与社会意识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挑战了封建专制极权的权威，个人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众多个体意识借助对话模式在小说文本中有机融合，小说叙述策略的优越性得以显现。建立在对话模式基础上的小说自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小说在具有统一的社会性背景基础上呈现各种不同的认识差异，在这些差异之间运用对话模式来展开文本叙述，产生戏剧冲突。对话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是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进行沟通的途径。基于对话性基础上的小说文本也同样具备这种沟通的能力，呈现出开放性，既有对自我、他人、社会开放的一面，也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的一面，小说也就具有延绵的生命力。道德说教与小说文本共同具备巴赫金所论及的“对话性”，道德说教是说教者与听者之间展开的一次对话，小说亦可以被视为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品人物以及人物与读者之间展开的多层面对话。对话理论有助于我们研究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道德建构以及说教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小说的内在发展规律，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十八世纪英国小说道德说教与叙述策略互动关系的新视角。

在巴赫金看来，文学评论界存在着对峙的两派。一派是侧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主义”，强调脱离社会性的纯文本审美愉悦；另一派是侧重文学创作动机的“思想派”，以评判文本的道德意识决定一切。两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巴赫金反对他们将二者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他这样写道，“本文的主旨，在于克服文学语言研究中抽象的